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父母支持、友谊质量对孤独感和抑郁的影响：检验一个间接效应模型

作者：田录梅，张文新，陈光辉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家庭和同伴是影响青少年发展的两个重要环境因素。作者从探讨抑郁和孤独感影响因素的角度考察了这两个环境因素的作用途径问题。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意见 1：

研究设计是横断研究，文中缺乏有关父母和同伴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是否受到时代效应影响的分析；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意见。横断研究设计的确是本研究的一个不足，它难以排除有关父母和同伴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所夹杂的时代效应。因此，根据专家的意见我们在讨论部分添加了这一分析（蓝色字体），并希望能在未来的研究中采用追踪设计来弥补这一不足。

意见 2：

数据来源单一。正如作者自己的解释，有关父母的支持仅仅来自于青少年自我报告，数据反映的是有关父母支持的感知而并非是父母的支持。

回应：

谢谢专家的意见。对于父母支持，我们采用青少年自我报告而非父母报告主要是基于如下两点考虑：（1）研究感知到的父母支持比父母报告的支持可能更有意义，因为很多情况下，父母认为是“支持”但青少年认为是“管束”，影响青少年发展的更可能是他们感知到的父母支持而非父母报告的支持。（2）由于国内外关于父母支持的研究（如本文所引有关文献）大多都是采用儿童青少年报告的感知到的父母支持。本研究这样做也是为了能与以往研究进行比较。但专家的意见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我们已经在讨论部分添加了对这一不足的分析（蓝色字体），期待在未来的研究中弥补这一不足，如，采用多主体评定法。

意见 3：

数据统计中作者没有说明有关验证性因素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数据是否是同一样本；模型中来自同一问卷的各个维度在模型中再次抽取潜变量的分析方法是否得当？（如，将总解释率约为 50% 的三个维度放进模型中，再次抽取潜变量，那么最后这个潜变量又能代表所要测查变量的百分之多少？）

回应：

专家的意见非常好！本研究中孤独感和抑郁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CFA）和探索性因素分析（EFA）的数据来自同一样本，即本研究的所有被试，因为我们并未对问卷进行任何修订，只是根据有关研究者（吴艳，温忠麟，2011）的建议，对问卷的结构进行检验以便于题目打包。吴艳和温忠麟（2011）提出，在进行结构方程建模和题目打包时，应先对问卷的单维性进行理论核查和数据 CFA 检验，如果检验结果不理想（多维），应重新检查和提炼测量结构。由于孤独感和抑郁问卷的维度性存在理论争议，故我们首先按照上述建议对变量进行了 CFA，检验结果不理想，继而进行 EFA 以重新提炼测量结构。提炼的目的是为了对众多题目进行项目组合，主要是一种打包策略。当然，这种提炼也是根据已有研究（如，陈会

昌等, 2004) 作为理论基础, 故而在因子结构确定后又进行了一次 CFA 检验以确保其结构效度。

因为任何一个题项都包括共同因子和唯一因子, 有些变异无法由共同因子解释, Anastasi (1988) 认为累积解释率最好在 60% 以上, 最低要求是 50% 以上。但在实际测量中, 由于测量误差的存在, 一个多维问卷往往很难达到理想的高解释率, 如最近在《心理学报》发表的三篇关于问卷编制的文章, 报告的多维结构的总解释率分别是 53.32% (毕重增, 黄希庭, 2009)、63.42% (邹泓, 蒋索, 2008)、49.29%、49.92%、43.81%、53.54% (董妍, 俞国良, 2007)。因此, 本研究中 50% 左右的累积解释率也基本达到了上述要求。而且, 这些因子与以往研究 (如陈会昌, 2004; 王君等, 2009; 吴文峰等, 2010; Samm et al., 2008) 发现的结果或提出的多维观点基本一致, CFA 的验证结果也比较理想。因此, 我们认为采用提取出的这些因子作为结构方程模型中的新指标是恰当的。当问卷题目较多时 (本研究中孤独感问卷的题目是 16 个, 抑郁问卷的题目是 27 个), 采用问卷的各个维度对题目进行组合打包重新抽取潜变量的做法是可行的 (卞冉, 车宏生, 阳辉, 2007; 吴艳, 温忠麟, 2011), 既可以简化模型, 又可以对数据的非正态性予以矫正 (卞冉等, 2007; 侯杰泰, 温忠麟, 成子娟, 2004)。

上述做法及理由已在文中呈现, 考虑到专家的意见, 我们已在文中做了相应修改 (蓝色字体), 以使之更清晰。希望我们的回答能让专家满意。如有不妥之处, 我们愿意继续修改。

意见 4:

文献中“年龄较小的儿童对父母的依恋更强, 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增强, 个体对父母的依赖会降低, 对同伴的依恋会增强”。的依据?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提出的细致意见。这一说法确实不够严谨, 因此, 我们已经对有关说法进行了一定修改, 添加了有关文献, 并使之与其后的例证或依据互为应照。修改部分已用蓝色字体标示。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

文章第一句“根据 Bronfenbrenner(1979, 2005)的生态系统理论(引自张文新, 2002)”令人费解, 张文新的文献是 2002 年, Bronfenbrenner 的有 2005 年, ——这是怎么引的?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细致意见。也很抱歉这句话的引用确实出现了笔误, 我们已经将 2005 字样删除。

意见 2:

正如作者之前的研究分析了相似的问题, 证明了交互影响模型及其三种具体模式 (独立模式、补偿模式和增强模式), 目前这个研究中又提出间接模型——那么友谊质量与青少年的孤独、抑郁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 每一种模型都成立? 哪一个真理? 增加了小学高年级的被试关系模型就会不同吗?

回应:

专家提出的问题非常好。我们的这两个研究均出自同一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正是为了检验专家提出的问题, 到底哪个模型是真理? 还是都是真理, 只是真理并不是普适性的而是有其不同的适用范围? 我们的假设是后者, 即: 无论哪一种模型都是成立的, 但分别有其不同的适用条件。例如, 对于青少年来说, 交互影响模型仅适用于青少年早期且对孤独感和抑郁有不同的交互模式, 到青少年中期则适用独立模型, 该假设已在我们的上一个研究中得到验证。考虑到间接效应模型更强调亲子关系的重要性, 同时也需要个体已经建立起较稳定

的同伴关系 (Hellenthal, 2006), 可能更适用于童年期较年长儿童, 对于更重视同伴关系的叛逆青少年来说未必适用。因此, 本研究增加了小学 5 年级的学生作为被试, 以检验这一理论假设的适当性。考虑到专家的意见, 我们已在问题提出部分增加了相关文献 (绿色字体), 以使之更清晰。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作者基本上回答了审稿人提出的问题。但还存在着描述不清等问题。如, 第三个假设的提出; 友谊质量问卷的一致性系数是整个问卷的还是前 5 个维度的没有说清楚; “相关结果表明父母支持与抑郁有跨性别、跨年级的一致性相关, 而友谊质量与孤独感的关系亦如此”; 结果中提到的“效应”是什么? 负值的意义?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认真细致的意见。我们已经按照专家的意见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修改 (以红色字体标示)。具体说明如下: (1) 对第三个假设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重新阐述; (2) 原友谊质量问卷的一致性系数是整个问卷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 (0.85), 我们已经在文中对此明确化并补充了前 5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 (0.91), 同时对关系网络问卷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也做出了同样修改; (3) 对“相关结果表明父母支持与抑郁有跨性别、跨年级的一致性相关, 而友谊质量与孤独感的关系亦如此”一句重新进行了表述以使之更明确; (4) 结果中提到的“效应”即影响(effect), 分为直接效应 (direct effects)、间接效应(indirect effects)和总效应 (total effects) (前二者之和), 三者均可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报表中得以呈现, 分别指“预测变量 X 对结果变量 Y 的直接影响、X 通过中介变量 M 对 Y 的间接影响、X 对 Y 的总影响”。正负值表示的是效应或影响的大小及方向, 如“父母支持对孤独感的直接效应是-0.19”是指父母支持负向影响孤独感 (父母支持越高, 孤独感越低), 其直接效应的大小是 0.19。在报告中介效应或间接效应时除了报告该效应的大小, 还要报告它与总效应的比值或者它与直接效应的比值, 以衡量中介效应或间接效应的相对大小。上述解释的依据详见: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刘红云.(2004).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 *心理学报*, 36 (5), 614-620.

审稿人 2 意见:

可发。

第三轮

编委专家意见:

作者按照两位审稿人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了两次修改, 审稿人基本满意。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已批注在稿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文字表达不够简洁, 需要进一步压缩。修后可发。

回应:

谢谢编委专家对本文细致而耐心的指正。我们已经根据专家的批注一一做出了相应修改并在批注内逐一进行了回答 (蓝色字体), 对个别不需修改的批注也在批注内做出了解释 (蓝色字体)。由于专家是以批注形式提出的建议或建设性问题, 为保留这些批注以供对照, 我们这次修改是在修订状态下进行的 (如果不是修订状态, 很多批注会随着修改消失), 由于修订格式引起的阅读不便还请专家谅解 (如果不习惯修订格式, 可以在 word 文档的“视图”里取消“标记”, 修订格式将会隐藏)。再次表示感谢!